

多元视角下口述历史方法的探索与实践

李德英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多元视角下口述历史方法的探索与实践 / 李德英主编.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7-220-11139-6

I. ①多… II. ①李… III. ①口述历史学-研究-
中国-文集 IV. ①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80927 号

DUOYUAN SHIJIAOXIA KOSHU LISHI FANGFA DE TANSUO YU SHIJIAN

多元视角下口述历史方法的探索与实践

李德英 主编 张 杨 张 宸 张 艺 英 副主编

责任编辑	吴焕姣 蒋科兰
版式设计	戴雨虹
封面设计	王书艳
责任校对	吴 玥
责任印制	王 俊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E-mail	scrmcbs@sina.com
新浪微博	@四川人民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 86259624 86259453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624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2.5
字 数	203 千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11139-6
定 价	39.80 元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序 言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从 2013 年开始组织本科生、研究生从事口述历史实践教学活 动，已经六年有余。这六年，师生们不畏酷暑，每年夏天都到成都周边田野考察地做口述访谈，从中和场、高店子这些人类学家曾经考察过的集市，到大邑县安仁镇、新津县五津镇这些近代四川历史上的风云小镇，再到青白江这个因工业而兴起的城区。除了组织学生集中起来做口述历史项目外，我们的师生还就一些专题展开口述访谈，例如日军大轰炸给成都造成的伤害、四川解放初期的基层政权建设、20 世纪 50 年代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三线建设的历史记忆以及某些历史事件当事人及其后代的访谈，学界精英和海外著名学者访谈，等等。至今，累计形成完整的个人口述档案 302 份，视频 1559GB，音频 601 小时（即 36060 分钟），文字 729 万字。另有访谈时搜集的族谱、回忆录、日记等民间资料若干，以及档案及文献复印件 872 卷。

四川大学的口述历史实践活动，离不开学界同人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一开始有做口述历史想法时，就得到了人类学界朋友们的支持。西南民族大学的张原副教授和汤芸副教授，每年都来川大为我们开讲座，培训学生，从口述历史的理论与方法，到口述访谈的态度和技巧，都给予我们很多的指导和帮助。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左玉河研究员，中国大陆学术界口述历史访谈和研究的前辈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定宜庄研究员，南开大学王先明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李帆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冯筱才教授等，均对我们的口述历史项目给予充分的关心和指导，光临川大为师生开设口述历史理论与方法

的讲座，结合自己的研究主题畅谈口述历史与史学研究的关系。

2016年4月，在四川大学社科处和历史文化学院领导的关心、支持下，我们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江安校区）举办了“口述史与共和国史研究”高端学术论坛，会议邀请了数十位来自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出版机构与合作单位的专家学者出席。历史学界和人类学界的很多前辈和同人，齐聚一堂，从不同的角度，对口述历史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共和国史的研究进行探讨。

如何更好地将口述史与共和国史研究结合，推动其在理论方法、专题研究等方面的发展，考察历史学与人类学在口述史研究中的关系与影响，是本次论坛的主题，相关议题引发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

该论坛中，有的学者以较为宏观的视野讨论口述史的学科理论、实践方法等问题。李德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简要介绍了主办单位既有口述史研究成果与经验的基础上，对本次会议的缘起做了说明，指出口述史或许能为中国史学研究提供新的空间。李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总结了近年来口述史理论研究的新进展与学者们主要争论的问题，建议加强相关理论建设，重视口述成果的学术化编纂，促使口述史学早日进入主流史学领域。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强调了口述历史与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密切关系，指出应依次通过确定主题、选择对象、案头工作三个环节做好前期准备，访谈中要与口述对象建立信任且一定要进行多轮访谈，在后期整理中应重视“规范化”。张思（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提出了“田野历史学”的概念，认为田野历史学是文献考证和田野调查的结合，对提升口述史研究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其核心是让被访对象讲述历史，以补充并重构既有的高层的、精英的历史。定宜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基于自己的实践经验，指出口述史应注重历史学自身的长处。具体而言，就是利用史学功底做足案头准备工作，在厘清历史制度的基础上提出访谈问题，在口述现场做深入回访，而后期整理时，史学的文献学、校勘学功夫也十分重要。胡英泽（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则强调田野访谈的问题意识，即只有将口述史料放到没有答案预设的问题上，才能赋予它意义。同时要了解并尊重民间社会的具体实践逻辑，例如在土改运动研究中对本地居民与外来户关系（即“土客关系”）的探讨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口述史的生命在于深入田野，在于具体细微的专题研究，有的学者即以此来分享对口述史与共和国史研究的体会。王先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通过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立之初优先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工业到后来逐步转向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历史进程，即从“先工”到“优农”的战略转向，突出共和国的时代和制度背景对开展相关口述史研究的基础性意义。刘世龙（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介绍了成都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诉讼案概况，指出轰炸受害者在口述中“情感度很高”，研究者应尽量减少干预。由于受访者的记忆多样、杂糅且叠合，因此，口述记录要与档案材料相互参照，相互印证。辛旭（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报告了其团队对西方学人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哈里·迪金森（Harry T. Dickinson）的口述访谈细节，指出口述受访者也有较强的主动性；在关注个人生命史、学术教研史和在华经历的同时，辛旭还提出了关于西方儿童史的口述史计划。王川（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通过报告藏区的口述访谈及其对藏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认为口述史应被看作一种任何学科都可借鉴的方法。王春英（中共四川省委党校）以“5·12”汶川特大地震灾难幸存者口述访谈为主题，认为口述史对灾难发生时的情景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对灾难经验的总结可以增强危机意识，促使人们尊重自然规律并对受灾群众生活予以持续关注。王国平（都江堰市文化产业科）同样关注了“5·12”汶川特大地震都江堰幸存者口述，指出要特别注意由于受访者心理阴影造成的幻觉描述等问题。

人类学的学科理论与田野经验，为口述史研究提供了借鉴资源，同时口述史也推动了人类学对自身的反思。张佩国（上海大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认为口述史的实践面向几乎涵盖了历史学的每个研究领域。在民族志实践中，口述史对探索连接历史和当下的“介质”具有特定意义；民族志的“表述权威”“道德感”等田野工作伦理，又对理解口述文本的生成提供了理论上的帮助。张江华（上海大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以其在广西的田野调查为实例，指出口述材料一旦形成文本后，容易产生“去脉络化”的现象。而且，由口述对象书写的文本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口述史学者倾向于在案头准备中预设问题，而人类学家则更强调“观察”的意义。彭文斌（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典范叙事”（Exemplar Story）的概念，即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具有本地特质和认同感的叙事，而谣言、记忆等话题对口

述史研究都非常重要。抗战时期美国飞行员在凉山地区被当成奴隶使用的谣言与搜救队的进入就形成了一种“典范叙事”，也呈现了民族国家的构造与叙事过程。张原（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从人类学学科史的角度强调了其与历史学、社会学之间的紧密联系。口述历史被研究历史实践的人类学所关注，它具有不同的表现特质与呈现形态，并涉及“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问题，因此，口述历史“为人类学细致考察和深思不同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之历史过程，提供了一个关键路径”。汤芸（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以民主改革口述实践为例，指出“物”在口述访谈中起着重要作用：如肥皂、军用桶是一种标示记忆点之“物”，汽车、白米饭则是一种寄托口述人情感之“物”，因此，口述史不仅关乎“人”，也关乎“物”。

在圆桌会议中，学者们集中讨论了在口述史实践和研究中，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关系及其对该领域的影响。张佩国认为没有必要刻意区分口述史的方法究竟是历史学还是人类学，双方都可借鉴，口述史恰恰为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提供了一个相互学习、相互讨论的空间。定宜庄则指出，在多数学者认为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已成为口述史研究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时，历史学的功底和长处或许才是口述史研究未来发展的重要动力。王先明则提议跳出人类学或历史学窠臼，追溯传统中国“口口相传的历史”，并将其与当代中国史学眼光向下的重大变革结合起来。左玉河通报了口述史研究领域的几项动态（唐纳德·里奇的《牛津口述历史手册》中文版及《当代中国的口述历史研究综述》即将出版，“国际视野与本土经验”学术研讨会拟于年底召开），并提出口述历史进课堂等建议。最后，王东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对论坛作了整体总结，指出这是一场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间的深度对话，与会学者在对口述史的多元认知方面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强调了对口述史的史学性认知。口述史的意义之一或许就是帮助历史学家“做一个转身”，对自身研究展开反思。

该次学术论坛论题集中，讨论热烈。首先，关于口述史实践的原则与规范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应强调史学优势，重视前期工作，重视田野经验与问题意识。其次，基于专题研究的口述经验，学者们认为以下因素值得关注，如时代背景与制度变迁的梳理，档案资料与口述记录的互证，口述记忆与学科历史的重构等。因此，该次研讨会提出和争论的问题，体现了与会学者在口述史研究中的新探索和新成果，也为相关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

本论文集是在该论坛基础上编纂而成，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是根据上述学者提供的学术论文或口头发言整理的文稿，经本人同意后，编辑成《探索与争鸣》，充分展示学者们的不同见解。下编《实践与学习》，主要是四川大学这几年口述历史实践活动的总结和回顾。李德英、张宸的《高等学校如何开展口述史实践教学——从我们的工作谈起》从高等学校基础学科实践教学出发，介绍了四川大学的做法，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反思。张杨、张艺英的《口述史的步骤和流程：以四川大学新津口述历史调查为例》则就一次具体的口述历史实践活动进行总结，介绍了展开口述历史调查活动的经验和规范管理。李德英、袁上的《如实录入：口述档案中的文字转录原则》一文，对口述资料后期整理工作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张杨、田玥、张艺英、袁上的《重返中和场和高店子：脱鲁岱、施坚雅之后川西平原的赶场习俗变迁（1940-1980）》是对经典田野调查地的回访和川西地区赶场习俗的进一步考察。廖羽含、阎翠、秦仆、柳京廷的《孔雀西南飞：浮沉中的三线人》是三线建设重点城市德阳的十多位三线建设者及他们的后代的口述历史，讲述的是与时代脉搏紧紧相连的三代人的青春、梦想与未来。上述几篇文章，主要撰稿人都是四川大学的学生，写作这些文章时，他们还是本科学生，有几位是研究生。通过参加口述历史项目，他们不仅受到了专门的学术训练，还学到了不少做人的道理。

总之，该论文集既有成就卓著前辈们的思考与争鸣，又有初出茅庐后学者的学习与探究。无论地位与年资，大家都对口述历史的探索与研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作为编者，我们对学界前辈、同人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对几年来一同经历酷暑严寒的师生们的努力表示衷心感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将在口述历史学术实践的道路上继续探索，希望得到各界人士一如既往的支持与帮助。

口述历史的明天更美好！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李德英

2018年1月10日

目 录

序 言	(001)
上编：探索与争鸣	(001)
近年来中国内地口述历史理论研究状况简评	(003)
口述与史学的关系	(010)
口述史料的采集整理与当代中国史研究	(016)
田野历史学与国史研究	(022)
田野访谈中的问题意识与社会实践	(026)
口述史与民族志的工作伦理	(030)
口述历史：人类学历史研究的一个路径	(032)
口述史中的“人”与“物”	(040)
广西壮族地区田野调查	(046)
记忆、飞虎队与大凉山	(049)
从“先工”到“优农”的战略转向：新中国建设路向的历史选择	(054)
口述与档案——以法庭举证日军轰炸成都为例	(060)
对西方学人进行口述史访谈的体会与展望	(067)
“5·12”地震口述资料的整理问题	(073)
“5·12”大地震灾难口述史实践体会，兼及《现在的我们——5·12大地震 都江堰幸存者口述》成书过程	(076)

下编：实践与学习	(085)
高等学校如何开展口述史实践教学——从我们的工作谈起	(087)
口述史的步骤和流程：以四川大学新津口述历史调查为例	(104)
如实录入：口述档案中的文字转录原则	(115)
重返中和场和高店子：脱鲁岱、施坚雅之后川西平原的赶场习俗变迁 (1940-1980)	(131)
孔雀西南飞：浮沉中的三线人	(164)
后 记	(188)

上
编

探索
与
争
鸣

口
述
历
史

多元视角下口述历史方法的探索与实践

2016年4月9日，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的“口述史与共和国史研究”高端学术论坛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举行。会议邀请了数十位来自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出版机构与合作单位的专家学者出席。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研究逐渐展开，历时30余年，已形成了一定的学术自觉。如何更好地将口述史与共和国史研究结合，推动其在理论方法、专题研究等方面的发展，考察历史学与人类学在口述史研究中的关系与影响，是本次论坛的主题，相关议题引发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

本次学术论坛论题集中，讨论热烈。首先，关于口述史实践的原则与规范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应强调调史学优势，重视前期工作，重视田野经验与问题意识。其次，基于专题研究的口述经验，学者们认为以下因素值得关注，如时代背景与制度变迁的梳理，档案资料与口述记录的互证，口述记忆与学科历史的重构等。因此，本次研讨会提出和争论的问题，体现了与会学者在口述史研究中的新探索和新成果，也为相关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

本篇所取与会者的报告，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近年来口述历史项目及成果进行梳理，希望能引起学界的共鸣。需要说明的是，报告为录音整理，得到了学者本人的修改和认可。

近年来中国内地口述历史理论 研究状况简评

李 帆 |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Oral History），即把口述历史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是从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的，1948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机构的建立，当是一个标志。此后，相关的学术著作一再问世，理论和方法也日渐成熟，至今已蔚为大观。口述历史在中国大陆也有一定传统，有学者认为，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各类革命回忆录和文史资料的大量采集、出版，就是当时的口述历史工作成绩。不过，应该承认，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在中国大陆主要还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以后起步的，90 年代后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不仅在实际工作做很多，而且在理论探讨上开始有了一定的学术自觉。最近十余年来，更是在理论和方法论的探索上有所进步。

一、口述历史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学者开始关注口述历史研究。这一时期，学者们主要从事外来成果的引进、介绍工作。如杨雁斌先生对国外口述历史发展与现状的评介，对国外口述历史理论与方法较为系统的介绍，对口述历史的研究对象、学科特征等做的初步阐发，为促进国内口述历史事业的发展贡献颇多。其他学者也在这方面有所贡献，使口述历史的理念、方法为更多学界同人所了解和把握。不过，这些文章也存在若干不足，如对欧美主流史学

界对待口述历史的态度缺乏清晰的描述，有的文章甚至对此刻意回避，故而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解。

进入 21 世纪以后，大陆在口述历史理论研究方面有所深入。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一系列主客观因素共同促成的。一方面，口述历史作品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为本土化的口述历史理论研究创造了条件。于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还有一些学者虽然不专门从事口述历史的研究，但也非常重视，呼吁强化口述历史的理论探讨。另一方面，口述历史的学术交流平台也逐步建立起来。2004 年，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在扬州大学成立，之后，陆续举办了数次学术研讨会。当代上海研究所也举办了海峡两岸口述历史研讨会，并出版了论文集。另外，专业学术期刊对口述历史理论研究成果的发表、转载，也都比较重视。这些有利因素形成了巨大的推动力，促使口述历史理论研究不断向前发展。

这十余年间，与口述历史相关的各方面学术问题，特别是口述历史的理论研究，较之以往确实有新的进展，而且出现了《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务》《本土化视域下的口述历史理论研究》等与理论相关的专著和学术论文集，并呈现逐渐深化的态势。其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更全面地介绍海外、境外口述历史的发展状况，尤其是理论建设的进展。这一时期，除了持续关注美国、英国等欧美国家口述历史的最新进展之外，评介港澳台地区口述历史成果的文章也有所增加。欧美的两部重量级口述历史专著《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和《过去的声音——口述史》中译本的出版发行，为大陆学者全面了解英美口述历史的发展进程和理论建树，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杨祥银在介绍国外口述史学成果方面有较大贡献，他先后发表的《口述史学：理论与方法——介绍几本英文口述史学读本》《美国口述历史教育的兴起与发展》《口述史学的兴起：从“档案史学”到新社会史学的转向》等论文，借鉴、吸收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口述史学界的最新成果，对口述历史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新的阐发。王炎的《海峡两岸的口述史研究与交流》一文，对我国台湾地区口述历史的发展历程作了系统介绍，特别对“二二八”事件的口述历史成果进行了详细说明，向大陆读者展示了台湾口述

历史的成功经验。^① 2010年第4期的《郑州大学学报》上,刊发了三篇介绍港澳台口述历史现状的论文:许雪姬《台湾口述历史的发展》、王惠玲《补白、发声、批判、传承:香港口述历史的实践》、林发钦《澳门口述历史的回顾与思考》。从这几篇文章可以看出,虽然港澳台地区的口述历史事业均有长足发展,但是,在学科建设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

第二,通过回顾大陆口述史学的发展进程,呼吁重视口述历史的理论研究。学术史的功能之一,是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反思和检讨学术发展进程的方式,获得学科发展的方向感,使学术更成熟地走向未来。对口述史学发展进程的回顾与反思,具有同样功能。在这方面,杨祥银《当代中国口述史学透视》^②、姚力《我国口述史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③、左玉河《热点透视与学科建设:近年来的中国口述历史研究》^④等是代表作。这几篇文章对大陆口述史学的发展进程与现状进行了系统总结,皆认为口述史学面临着诸多危机,其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口述历史理论研究的薄弱、滞后。具体来说,就是“介绍西方的多,具有独到研究的少”“零星研究的多,系统研究的少”“口述历史的基本概念、基本属性、学科归属”等问题都模糊不清,“较为完备的口述历史理论和方法”就更谈不上了。在目前口述历史图书出版一片火爆的局面之下,潜藏着“三大隐患”,除了“缺乏工作规范”之外,就是“理论先天不足”“研究缺乏深度”,而欲强化研究深度,必须在理论构建上下大功夫。鉴于理论研究方面的严重欠缺对口述历史健康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他们一致呼吁重视口述历史的理论研究,将其置于学科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考虑。

第三,对口述历史的特征、价值、功用等理论问题,作了初步探讨。有学者认为,口述历史的基本特征体现在“民主性”“合作性”“动态性”“跨学科性”四个方面。^⑤ 口述历史的价值,特别是学术价值十分明显,“从工具运用角度而言,口述历史的出现,由记文到录音、摄像,是历史学领域的一大

① 王炎:《海峡两岸的口述史研究与交流》,《扬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② 杨祥银:《当代中国口述史学透视》,《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

③ 姚力:《我国口述史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

④ 左玉河:《热点透视与学科建设:近年来的中国口述历史研究》,《中华文化论坛》2011年第1期。

⑤ 杨祥银:《关于口述史学基本特征的思考》,《郑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飞跃”“从历史记录的广度而言，口述历史提供了相当广阔的空间”，所以“口述历史在复原历史方面，有其他任何档案、文献数据无法替代的价值”。^①在功用方面，口述历史“可以填补重大历史事件和普通生活经历中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空白，或至少弥补其不足”“它还是一种新的历史教育手段”。口述历史的出现，“不仅推动历史学本身的发展，而且引起其他学科的广泛兴趣，并试图借助这一方法来加强本学科的研究工作”。^②

第四，对口述历史方法论的研究有所开展。口述历史在国内还处在摸索阶段，尚缺乏成熟的研究方法和运作模式，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者为此做了努力，如李向平等著有《口述史研究方法》，定宜庄、刘小萌等学者曾就如何进行访谈、怎样对口述数据进行整理等问题，总结了他们的心得体会。定宜庄多次呼吁，现在应多进行口述史实践，积累经验，锤炼方法，核定体例。其他研究者也很注重借鉴前人的方法、经验，如对唐德刚的口述历史方法进行总结，认为他在处理口述史料与文献资料方面已经提供了成熟的经验，值得效仿；也有研究者对唐德刚的研究模式提出质疑，认为用大量的文献资料去补充、改写口述资料，违背口述历史的学术性质，并不可取。应该说，大陆口述历史作品众多，成功之作也非鲜见，但是，其中应用到的方法论，大都没有得到梳理、提炼，作者影响力远远不及唐德刚，使其仍是主要取法对象。

二、口述历史理论的主要争议问题

近年来，学术界谈及口述历史的理论问题时，在很多命题上并未达成共识。现将一些见解择要介绍于下：

关于口述历史的定义，现有三种观点：一是强调口述历史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搜集口碑数据，即口碑数据等于口述历史；二是认为口述历史的工作应该是在搜集口碑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写出具有解释力的历史学术著作；三是认为口述历史的内涵是多重的，其定义应既包括史料也包括史著。这三种观点，各有支持者，但都缺乏深入论证，留有探索空间。

关于口述史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史学分支学科，不少学者认为，口述

① 熊月之：《口述史的价值》，《史林》2000年第3期。

② 杨祥银：《试论口述史学的功用和困难》，《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

史学应该而且可以成为历史学门类之下的二级学科或三级学科，但是，这种意见还停留在倡议阶段，从史学史、史学理论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的全面、深入的论证，还非常罕见，如何在学科分类目录中具体落实，也是歧见纷呈。

关于口述历史与访谈录、回忆录、自传、传记的区别，很多学者主张应严格界定口述历史的学术范围，不能将访谈录、回忆录、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混为一谈。但是，如何处理口述历史与访谈录、回忆录、自传、传记的区别，如何区分它们各自的学术领地，则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关于口述历史的可信性问题，绝大多数大陆学者反对以“口说无凭”等理由来质疑口述历史的价值，强调口述材料和文字材料仅是载体不同，口述材料的可信性并非一定低于文字材料。但是，“求真”毕竟是史学的基本要求，人类的记忆机制、口述表达方式可能导致的失真以及其他问题，也应以正视，如口述者的选择性记忆问题，就非常值得关注；口述者的预设立场、个人好恶、诉说的目的、口述时的精神状态等问题，亦关联着口述历史的可信程度。对于这些，当然应该从采访者、口述者、口述情境等各方面因素进行综合考察、系统研究，才能最终解决可信性问题。至于如何考察和研究，学者们也是各有所见。

关于采访对象问题，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口述史学区别于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之处，就在于它适应了“眼光向下的革命”的史学大趋势，将主要研究对象设定为普通百姓，而非把主要精力放在采访社会名流上。但也有一些研究机构、学者持有不同看法，有的机构对口述历史非常重视，不过其编研重点是“要人大事”，仍是在精英层面上做文章。

关于是否必须使用录音设备，一些学者认为，口述历史关键在于搜集口述史料，用不用录音设备，是否保留采访录音，都不是重要问题。另一些学者则将“保留原始录音”作为口述历史的基本条件。

关于是否保留问答形式，起初在口述历史领域里，唐德刚模式流行，口述历史正式出版物，都是在原始访谈的基础上，增补资料，重写而成，在正式发表、出版之时，已经看不到原来双方的问答、互动。目前，一些学者对此发表反对意见，主张保留问答形式，突出口述特点。这种主张的不同，实际反映出对于口述历史作品的体例问题，或曰口述历史的呈现形式问题，学术界仍有分歧。

三、进一步的思考

整体而言，口述历史的理论研究，近十余年来有新的进展，而且在不断深化当中。但与口述历史业已取得的实际成就相比，理论建设仍然大大滞后，相当薄弱，正如有学者所言：“经过 20 多年的实践，建设中国自己的口述史学理论已经具备了一定条件，但就目前国内口述史学的状况来说，理论性的研究还相当薄弱，这是我国口述史学发展的第一个困境。”^① 理论建设的不成熟，不仅会使研究无法获得理论支撑很难深入下去，而且会使口述史学始终停留在浅层次的学术边缘地带，无法进入学术主流。所以，强化理论建设，确为口述历史研究和口述史学发展的当务之急。在这方面，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在接受和运用西方传入的口述历史通用理论的前提下，加强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建设。

目前我们所接受和运用的口述历史通用理论，大都来自西方，“拿来主义”的痕迹明显，缺少自身的进一步解析。实际上，中西文化传统、社会状况、制度体系、风俗习惯等都有较大差异，如西方具有较为深厚的法制传统，是契约型社会，而中国有自身的传统，更像一个人情社会，所以口述历史工作者在具体工作过程中，就很可能面临不同的采访情境，采访者与口述者的关系处理恐也有中西之别。在这种情况下，理论设定和工作方式若完全照搬西方，可能会带来某种困境。因而强调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口述历史理论，提供对于本土更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体系，显然是必要的。

第二，挑战传统史学认识，早日进入主流史学领地。

口述史学目前所处的状态，还在主流史学之外的边缘地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口述历史无论是作为史料还是史著，其可信性某种程度上还被怀疑。如在史料学上，学界认可四种史料（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口碑史料、风俗习惯）为史学研究的基本史料，其中文字史料最被认可，认为可信度最高，而口碑史料始终很难与文字史料比肩。这里当然有认识上的误区，但在传统史学理论和主张占主导的情况下，这样的认识一直居于统治地位。所以，

^① 姚力：《我国口述史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